

对译与解读：严复《政治讲义》（I）

沈 国威·郭 玉红

《政治讲义》是严复于 1905 年夏初应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骆君维廉之请而做的连续讲座的记录稿。^[1]严复的讲座分为 8 次，内容概要分别是：

- | | |
|-----|------------------------------|
| 第一讲 | 导论：历史学与政治学；论政治学是科学；政治学之目的与方法 |
| 第二讲 | 续论政治学之方法；国家民族之性质；国家形态 |
| 第三讲 | 论国家发生史；发展阶段史 |
| 第四讲 | 欧美国家形态、制度史 |
| 第五讲 | 论自由：语词与概念 |
| 第六讲 | 续论自由 |
| 第七讲 | 论自由的实现 |
| 第八讲 | 总论：专制、自由、立宪 |

根据戚学本的研究，^[2]《政治讲义》是以英国历史学家约翰·西莱（J. R. Seeley, 1834~1895）的著作：*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1885 为底本的翻译。^[3]和其他译著的情况一样，严复在翻译过程中对原著有所增减取舍。就《政治讲义》而言，第三、四、七、八部分比较忠实于原著，而第一、二部分中关于政治学之所以为科学以及科学本身的性质、方法的论述；第五、六部分关于“自由”的讨论严复都加入了大量自己的观点、主张与诠释。而正是这些与原著不同的部分反映了严复译《天演论》以来的科学观，是解读严复思想的极为真实的材料。有鉴于此，笔者们计划采用对译与解读的方法，对《政治讲义》做一次细致的梳理。本文讨论第 1 讲，西莱的原文由郭玉红译成现代汉语，严复的讲演稿由沈国威解读。

<i>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i> , pp.1-29	《严复集》五，1241~1250 页
第一讲	自叙
p.1 自我任职，从事教学至今已有十六年之久。我所教授	严先生曰：余治天学，至于有

¹ 王栻主编《严复集》五，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 1241~1316 页。

² 戚学本《严复政治讲义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

³ 关于西莱的生平等参见戚学本前揭书。另，本文考察使用的原著为：*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by Seeley, Sir J.R.1896. Macmillan & Co.

的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与政治哲学(后者是剑桥大学文学士荣誉学位培养计划科目之一, 现提议更名为政治科学⁴⁾), 是公认的截然不同的两个科目。在这两门科目的教学当中, 我通常不会采用同一种教学方法。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的讲解, 通常会采取正式的公开讲座的形式, 而政治哲学的讲授是以课堂研讨的方式进行。

之所以会采取课堂研讨的形式, 是因为缺少可以向学生推荐的、符合要求的教材。我坚信在需要缜密思维和精确用词的学科的教学当中, 课堂研讨的形式是非常实用的。在我看来, 在学科内容没有清晰、有序、系统地编辑成册的情况下, 这种教学方式不仅非常实用而且必不可少。我认为政治科学, 就曾处于这种困境当中。在我看来, 诸如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著述, 并不能够满足当代学生的需求, 而新出的文本或不尽如人意, 或出于各种原因无法普及至剑桥学生。

p.2 但是, 课堂研讨的方式只适用于小班教学, 出于某种原因, 偶尔以正式的讲座形式进行授课也是可取的。早些年我也开设过讲座, 只是近来较少这样做了。但今年我提议再次开设讲座。这次, 我会尝试以研讨班研讨的形式和讲座班正式讲授的方式展开政治科学的教学。所以, 今年, 研讨班和讲座班互相关联, 正如以结业论文和研讨形式进行的单人授课和我的同仁轮流的公开讲座互相关联一样。

在看到这个通知之后, 你们当中一些人会想“什么? 你是历史学教授; 但是你却告诉我们今年你不准备讲授历史学, 而是与之截然不同的政治科学或政治哲学!” 如果我听到这种反对的、无理无据的声音, 我的回答是: 当然, 我要讲授政治科学, 但是,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不会讲授历史学呢? 确实, 今年, 我不会选择一个历史时期, 探讨、讲述在这一时期发生的事件, 如若如此, 便真的是开设历史学讲座了。我认为, 历史学的讲授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在讲授政治科学的同时进行, 即讲授政治科学就是在讲授历史学。

p.3 下面就来介绍以下这个悖论——这里使用的是“悖论”一词的本义即“听起来像假命题的真命题”——我连续多年建议剑桥大学刚刚开始历史学研究的学生思考这一悖论。即

明之世, 波兰人歌白尼, 尽破地静天动旧说, 证地为日局行星之一, 岁岁绕日, 与诸纬彗孛同以定时循轨, 即日亦非常静不徙者。群从围绕, 太阳居中, 以空游悬行, 趋于御女。盖一出入息间, 不知其几千万里也。喟然叹曰: 伟哉科学! 五洲政治之变, 基于此矣。盖自古人群之为制, 其始莫不法于自然。故《易》曰: “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有其至高者在上以为吾覆, 有其至卑者居下以为吾践。此贵贱之所由分, 而天泽之所以位也。乃自歌白尼之说确然不诬, 民知向所对举而严分者, 其于物为无所属也。苍苍然高者, 绝远而已, 积虚而已, 无所谓上下也。无所谓上下, 故向之名天者亡。名天者亡, 故随地皆可以为极高, 高下存乎人心, 而彼自然, 断断乎无此别也。此贵贱之所以不分, 而天泽之所以无取也。三百数十年之间, 欧之事变, 平等自由之说, 所以日张而不可遏者, 溯其发端, 作由此乎? 且天演者, 时进之义也。古之人发此者二几千年, 中西载籍, 莫不有考, 然而最后百年, 其学乃大盛, 得此以与向之平等自由者合, 故五洲人事, 一切皆主于谋新, 而率旧之思少矣。呜呼! 世变之成, 虽曰天运, 岂非学术也哉! 虽然, 尚有说焉, 夫背苦而向乐者, 人情之大常也, 好善而恶恶者, 人性所同具也。顾境之至也,

⁴ 原文为 political science。西莱使用 politics 的频次远远少于前者。这或反映了当时, 政治学作为一科之学的微弱地位。本文分别对译为“政治科学”和“政治学”。

使受所讲授的学科的限制，不能花较长时间阐释它的时候，我也会尽力在公开讲座上给予至少一次的充分阐述。但是在此次以“政治科学”为主题的讲座中，我要做的不只是阐述。我的出发点、我将要向大家阐释的政治科学体系的第一个概念就是：政治科学与历史学密不可分。政治科学是历史学的一部分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但我可以说离开政治科学的历史学研究是不完整的、残缺的，而离开了历史学的政治科学研究则是空洞而没有基础的——简言之：

p.4 离开政治科学的历史学是无果之树；

离开历史学的政治科学是无根之树。

本次讲座的目标就是讨论这一命题的真实性。我无须详述确立这一命题为真命题的重要性。一直以来，研究者认为历史学只与事实相关。显然如果我们把已被历史学验证的事实看做是构建一门科学的原材料，历史学就发生了根本性地转变。这种观点一方面赋予历史学研究一种全新的、生动的趣味，另一方面，或许有人会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历史至今持有的独特魅力。目前，有这样一种观点即历史学研究应当是一种放松、愉悦和享受，它有浪漫、珍奇、诗韵等考究的气息，假若以科学强烈、辛辣、刺鼻的气息取而代之，或许我们会觉得惋惜。至于这样取舍之后是否能够实现得失平衡则又是另外一说了；但无论如何，历史学研究的这种转变都是极为重要的，对于正处于历史学研究入门阶段的你们来说，选择以怎样的心态来进行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p.5 我想，你们一定经常听到有人说历史学研究是非常严谨的。“历史学研究多么令人兴奋”，更多情况下这种反应是因为历史学不是一个非常浅显的学科。熟知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有着最高的实用性和启发性，或许这一点很少会有明确的表述，那是因为很少有人质疑、否认它。似乎我们并不会确实地考察历史事件本身：我们认为对历史事件的了解是有实用性的，也就是说，这种了解是实现某种目的的一种手段。但是，这种实用性具体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各个方面”，我们如是以为。但是如果进一步寻找更为准确的答案，我们会发现，对“历史具有实用性”的判断或多或少地、直接地基于这样一个理论即“已经发生过的，或许会再次发生”。人类事件有其规律性，大体上来讲，同样的原因总是会产生相似的结果；因此，既然智慧源于对因果关系的掌握，

苦乐未尝不并居；功之呈也，善恶未尝不同域；方其言乐，而苦已随之；方其为善，而恶已形焉。夫人类之力求进步固也，而颠阶替乱，乃即在此为进之时，其进弥骤，其涂弥险，新者未得，旧者已亡，侏侏无归，或以灭绝。是故明者慎之，其立事也，如不得已，乃先之以导其机，必忍焉以须其熟，智名勇功之意之不敢存，又况富贵利行之污者乎？夫而后有以与时偕达，有以进其群矣。而课其果效，恶苦则取其至少，善乐则收其至多。噫！此轻迅剽疾者之所以无当于变法，而吾国之所待命者，归于知进退存亡之圣人也。乙巳十二月二十六日

第一会

不佞近徇青年会骆君之请，谓国家近日将有立宪盛举，而海上少年，人怀国家思想，于西国政治，所与中国不同者，甚欲闻其真际。不揣寡昧，许自今日为始，分为八会，将平日所闻于师者，略为诸公演说。非敢谓能，但此所言，语语必皆有本，经西国名家所讨论，不敢逞臆为词，偏于一人政见。数会以后，诸公将见此是格物穷理实事求是之学，固无虑意见之偏，宗旨之谬也。

查政治一学，最为吾国士大夫所习闻。束发就傅，即读《大学》、《中庸》。《大学》由格致而至于平天下，《中庸》本诸天命之性，慎独工夫，而驯致于天下平。言政治之学，孰有逾此者乎？他日读《论》、《孟》、五经，其中所言，

显然想要拥有这种智慧,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探究过去的人类经验,换言之,研究历史。

这个论点已经讨论的很清楚了,但是我希望你们认识到它是可以适用于所有学科知识的基本论点,而不单单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历史。正是这一论点赋予了知识实用性和不可或缺性,验证了关于智者的一个古老的说法,“智慧是重中之重,因此拥有智慧方能实现认知。”我们生活的世界有规律的运转,相同的原因总是会产生相似的结果;因此若要正确引导前行,我们必须记录观察所得,加以比较、概括,得出一般规律,这样一来对过去的了解才能引领我们认知未来。

p.6 我无需在此继续由来已久的、关于天赋观念、理性的真理和意识真理的争辩。只要我们大量的知识是归纳性的或是建立在对事实的观察之上的,就足够了。如果,我们把历史看作是对已发生事件的记录,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的知识来源是历史。选择什么样的归纳性科学并不重要,结论总是基于历史的。我们关于天文的知识基于既定时间和地点某个天文学家对天体运动的观察;我们对于生命规律的认知,虽然现在是以一般的形式呈现,归根揭底源于某个自然主义者,即自然历史学家对这个或那个植物或动物的历史记载。

p.7 历史记载的逐渐形成是文字历史与特定事实的记载相结合的过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文字不需要,起初也不是这么适用的。各领域的主要事实最初都是为同样的目的,以同样的方式记载的。我们称为自然科学的,柏拉图称之为自然史;普林尼关于各类奇妙自然异事的记载也被称为《自然史》;直到近来还经常有人把动物学称为自然史的。现在的历史书籍通常会删除大量事件,这些事件本身并不寻常、值得记录,但是本质上来讲更适合录入科学书籍。我们检索英国曾经发生过的气象学或者生物学事件记载的时候,我们不会去查看英国史的书籍。我们已经意识到这类事件不属于历史。但是,如果历史记录事件是为了找寻规律、引导人类生活的话,它当然也应当载入这类事件,因为正是这样的观察记录促成了自然科学史上的重大发现。在历史学诞生之初,这类的事件记载也弥补了大量的空白。在蒂托·李维的著述中,他利用自己所能获得的最古老的资料源,屡次节取、汇总特定年份发生奇异的自然事件,诸如 Privernmn 的一个公牛开口讲话, Corioli 出现血雨现象等。可以肯定是,跟早

大抵不外德行、政治两事——两事者,固儒者专门之业也。然则诸公今日,更何必舍其家鸡,而更求野鹜乎!

虽然,诸公来意,不佞有以微窥。盖缘生于二十世纪之中,当天下开门相见之会,亲见外洋学术事理,有实比吾国进步为多者。又数年以来,异说纷起,或称君臣之伦为可废,或谓吾人向称唯一无二之法制,每为西人所不由,而其众亦未尝去治而就乱,是其所以然之故,必有可言。故欲知西国见行政法的实如何,以与旧闻者比较,使论议有所折中。诸公之意,非如是乎?

此意甚佳,但有不可一蹴而至者。盖政治一宗,在西国已成科学,科学之事,欲求高远,必自卑迹。故当开讲之始,不妨先告诸公:欲得真知,先须耐性。且讲科学,与吾国寻常议论不同,中有难处:一是求名义了晰,截然不紊之难;二是思理层折,非所习惯之难。故或言者视为无疑,而闻者犹或待辨;有时语意已极明白,而犹以为深远难明;或自谓已悟,而去实甚远。今不佞惟有极力求其显易,用一名义,必先界释明白,若有未即领会之处,每期开会之先,祈诸公即便坦然质问,不佞当依次作答也。

今夕所论,未及政治本题,乃先言政治与历史相关之理。此语自表面观之,似若无甚奥义。虽然,侯闻吾言,始知其中大有新理也。盖二学本互相表里,西人言读史不归政治,是谓无果;言治不求之历

期的记录者相比，我们观察自然的好奇心只多不少；他们的盲信或许令人发笑，但是他们记载自己所见的自然现象的热情值得我们给予最真诚的尊重。那么，为什么现代的历史学家们对记录诸如此类的事件开始不屑于顾了呢？

p.8 原因显而易见。现在此类事件都是在仔细筛选后再加以记录的，但是在遥远的上古，记录者并不知道筛选的方法，他们也不是历史学家。现在我们对世界上发生的现象进行了领域划分，每个领域都有特选的研究和记述群体。我上面提到的两个例子，一个是生理学家的领域，一个是气象学家的领域。紧接着历史记载这一变化的是“历史”和“历史的”含义的特殊变更。最初被认为是历史的或者归于历史学科此类事件，确切来讲，不会因为是个别领域的专家当作特别的门类来记录，就不再是历史。只是，我们不再把他们当作历史来讲述，而是作为科学来对待。它们应当脱离历史，进入科学的门类。我们把它们看作是气象学或者生理学现象，而不是具有气象学或者生理学特征的历史事件。

p.9 历史，因此，作为常用的名词，是对一个又一个划入科学之后“剩下的部分”（*residuum*）事件的指代。我们通常认为历史记录是与人类相关的事件，这在大体上是对的，但主要是因为，与人类科学相比，我们所谓的自然科学较早地、成功地、在归纳基础上确立了体系。即使是现在很多与人类相关的事例，我们并不会把它们划入历史学的范畴，比方说生理学和病理学的事例。我们都无法从历史学家那里获得关于病例的信息，除非一种传染病大规模流行，并且产生了社会和政治影响。这是因为生理科学和病例科学已经成功囊括了部分与人类相关的领域。其他科学也已经掌握部分人类现象的研究。现在假设这些科学最终成功确立，我的问题是，历史将会如何？——这里说的历史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本身，或者说纯粹的历史。⁵当每门人类科学开创了自己的领域，“剩下的部分”最后是否也会完全消失？政治经济学讨论的是工业领域，法学讨论的是法律领域。那么历史学

史，是谓无根。诸公无谓此是陈言，须知十八世纪以前，已有言治不由历史者，希腊时如柏拉图，最后如卢梭。此二人皆诸公所习知，其言治皆本心学，或由自然公理，推引而成。是故本历史言治，乃十九世纪反正之术，始于孟德斯鸠，至于今几无人不如此矣。我们中国论史，多尚文章故实，此实犯玩物丧志之弊。虽然，外国亦有然者。故当前说出时，或谓以历史为科学材料者，文章之美，必不及前，而纪述无文，即难行远云云。然此皆明于一方之论，不知史之可贵，在以前事为后事之师。是故读史有术，在求因果，在能即异见同，抽出公例。此不独读史宜尔，即仰观俯察，人欲求智，莫不当然。尚忆东坡有言，后生读史，当作数次，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求治乱盛衰之故，则专意在此，而置其余，他日再读。或为地理，或为官制，或为词章，亦循此法。如此学成，自然八面可以应敌。其言甚当。此虽古法，至今尚可用也。

盖天生人，与以灵性，本无与生俱来预具之知能。欲有所知，其最初必由内籀。内籀，言其浅近，虽三尺童子能之。今日持火而烫，明日持火又烫，不出三次，而火能烫之公例立矣。但内籀必资事实，而事实必由阅历。一人之阅历有限，

⁵ 必须对两种不同的历史加以区分，其中一个特殊的历史，一个是普遍的历史。从特殊层面来看，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是历史这一课题的构成部分。我们有艺术史、科学史、发明、创造史。可能还有关于历史的历史。这种特殊的历史没有尽头，我们也不能说它不是正统历史，或不能产生有影响的结果。但是没人会把这类历史称作历史。历史本身被认为是普遍的历史。你们也非常清楚，作为教授，我不可能系统讲述托斯卡纳画派的历史。（节自 1891 年讲座第一讲）

家会认为, 比如说, 在经济学问题上, 他可以简单、扼要, 因为他可以推荐读者转向经济学权威以获得更加全面的阐释。现在, 我们假设所有这些科学领域未来都能取得快速发展, 那一天会很快到来吧? 到时, 在几乎每一个领域, 历史学家都能找到一些科学权威, 这样一来自己便无须详细阐释, 这些权威给出的解释会比历史学家自己所能给出的更好。那么, 紧接着这一天到来的, 历史学家是否会认识到自己已经成为多余? 就像我们现在几乎不再提及自然史一样, 到那时, 我们也会不再谈及人类史了吧? Dann wird einst ausgesungen Das alte ewige Lied. (德语: 曾经唱过的那首歌, 是一首永久的老歌。) 那个古老、永远的故事依旧会被述说, 只是历史学已经被科学吞没。

p.11 当我描述历史学消失的时候, 你会了解到我所说的历史学是一个严肃、认真的追求, 是面向成熟的人的研究。最近一些学者反对这一观点, 其中一位 Birrell 先生选我作为他的反驳对象——他认为历史学与其他任何科学并无关联, 因此科学领域的任何可能的发展都不会影响历史领域; 克莱奥是历史女神; 换言之, 重大事件会给人类带来自然的愉悦, 历史学只是这种愉悦的自然而然的文字表述。按照这一观点, 历史学家只是一个善于表达的、能够感同身受的叙述者, 只要人类能够感觉、享受, 他就不会失去功用; 历史学, 像诗歌一样, 随着人类的存在而存在。

我并不介意质疑这一点, 这并不是在贬低文学和诗歌。当然, 人们总是喜欢重大事件的生动表述, 但是如果把历史学看作是文学的一个分支, 它并没有什么优势。那些伟大的古历史学家受人欣赏, 当然一部分因为他们的辩才, 但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真实和深度。也就是说, 他们一方面确实是文人, 另一方面确是科学人 (men of science)。我上面所提到的科学的发展, 会让他们失去科学人的身份, 仅剩文人的角色。假如, 历史学家工作中较为严肃的部分——调查和概括——被专业领域的人接手, 那他们就只能提供富有表现力的表述了, 其重要性也会因此大幅下降。历史学家著述中所能囊括的确实信息, 在专家的著作中都能找到更为全面、精确的表述, 并且单单作为文学工作者、与诗人和小说家相比, 他们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因为他们必须严格忠于事实, 不能虚构、润色, 而在这样的条件下是无法展示自己的艺术天

故必聚古人与异地人之阅历为之。如此则必由纪载, 纪载则历史也。

是故历史者, 不独政治人事有之, 但为内籀学术, 莫不有史。吾国或谓之“考”。如钱币考, 钱币之历史也。《三通》之属, 至于一切之掌故, 盖皆为史, 不仅编年纪事, 而后可得此称。西人于动植诸学, 但凡疏其情况, 而不及会通公例, 与言其所以然之故者, 亦称历史, 如自然历史是已。

东西旧史, 于耳目所闻见, 几于靡所不书, 如李费《罗马史》所纪牛言雨血诸事, 与《春秋》之纪灾异正同, 而《史》、《汉》书志, 刘知几《史通》论之详矣。

而近代之史, 置此等事不详者, 亦非尽由人类开化之故, 乃因专门之学渐多。如日食、星陨, 则畴人职之。大雨、风、雹, 则有气候学家。甚至切于人事之刑政, 亦以另有纪载, 得以从略。如钱币则计学, 瘟疫则医学, 罪辟则刑法之学, 皆可不必如古之特详。大抵史亦有普通专门二部, 专门之史, 日以增多, 而国史所及, 乃仅普通者。

或曰: 前代之史, 所以为后人宝贵者, 不因事实, 亦由文辞, 顾古史之最以文辞称者, 亦由闲识孤怀, 见微知著, 其理关于哲学。若第论文辞, 则史且不及诗赋。又以其事之重纪实, 故其娱人, 不及小说家言。虽然, 科学日出, 史之所载日减于古矣。而减之又减, 终有其不可减者存, 则凡治乱兴衰之由, 而为道国者所取鉴者。是故所谓国

分的。这样他们就变成了普及者，受众也会主要是年轻人。显然，这样意义上的历史学在大学里是没有一席之地的。然而，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或许会作为文学一个无足轻重的分支存在的话，那我完全认同 Mr. Birrell 的观点。

p.12 我仍然认为历史传授智慧，是政治家的伟大的引导者。我认为历史学仅存的“剩下的部分”会像其他部分一样，被划入别的学科；那些毫无疑问仍隶属历史学家研究领域的事例也会在不远的将来被其他科学领域占据。但是，我并不认为历史学的变化会如设想的那么大，这样一来，“剩下的部分”不会渐渐减少或者被其他科学瓜分，而是会成为一门单独的科学。什么科学呢？政治科学。

p.13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讲授政治科学就是在讲授历史学。

在我看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一门科学都是随着历史学而缓慢发展的。每个人都能看到它和历史学有某种联系，并从历史获取大量材料，这就是政治科学。从另一方面即历史学领域本身来说，越来越多历史学家看到史实的不断累积蕴含的科学衍生的可能性。假若不存在一般性原理来归纳、整理这些史实，他们应当如何处理这些史实呢？而历史学家们汲汲以求的这种科学正是他们一直以来忽略的、与历史学紧密相连的政治科学。

现在我会更清晰地向你们介绍我所谓的政治科学。

当然，我们还是以“人类是社会的或者说群居的动物”这一事实为起点，但是我们要研究的并不单单是人类的社会性，而是与人类的社会性相关的一个特别的现象。因为，人类的社会性有多个方面，进而衍生了多个领域的科学研究；比如说，语言学和经济学。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这种现象。事实上，人类同其他动物一样以家庭形式群居。我们可以发现，与低等动物相比，人类家庭的这种联结更稳固，形式更加成熟。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发现，如果从哲学视角去分析这些发现——就是说，不要把它们当作我们已经非常熟知的现象来思考——是非常惊奇、出人意料的。我们发现除了家庭之外，还有另外一层联结，另外一个更高的组织形式。

p.14 本质上，连续性很少会中断，所以这种更高的组织形式与家庭并没有非常大的不同，有的时候，不会把它当作与家庭迥异的社会组织来进行解释，尽管通常情况下，它们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区别。几乎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境下，当你询

史，亦终成一专门科学之历史。是专门科学何？即政治之学也。

有科学即有历史，亦有历史即有科学，此西国政治所以成专科。问中国古有此乎？曰有之。如老子，如史迁，其最著者。而《论》、《孟》、《学》、《庸》，亦圣人见其会通，立为公例，无疑义也。顾中国古书之短，在德行、政治杂而不分。而西国至十九世纪，政治一门已由各种群学分出，故其理易明，其学易治。

世之有政治，乃五洲不谋而合之一事。其不谋而合者，以民生有群故。群之所始，《社会通论》所言，已成不易之说。最始是图腾社会，如台湾生番之“社”，西南夷之“峒”。其次乃入宗法社会，此是教化一大进步。此种社会，五洲之中，尚多有之。而文化之进，如俄国、如中国，皆未悉去宗法形式者也。最后乃有军国社会。不佞今所讲者，大抵皆此等社会之改制矣。宇宙有至大公例，曰“万化皆渐而无顿”。是以三社会之变化，方其始异，若不可分，当始成国，若无异于家族者然。虽为家族之时，其人所属，常有更大于家族者。譬如遇人，叩其籍贯，其人必有姓有名，有郡望地邑，最后有国，而所以别异其人者始全。名，其身之名也。姓，其族之姓也。郡望，其所居之地，抑所由出之地之名。而所最有关系重要者，莫如其国。国者，多数众民所合，而成一特别团体之名也。

问一个人，你会发现他认为自己属于一个大的组织，并且在其中他承担义务、享受权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也有与其他家庭成员共有的称呼；但是如果要对他进行充分定义、区分，你需要更深一层的事实，你应当了解他属于哪个国家。国家？那什么是国家呢？

p.15 当我说“我是英国人”的时候，我在说什么？我是在说我的出身或者家庭吗？我不能完全说不是。我认为自己与其他英国人有某种亲属关系，正如我们都一样，属于原始安格鲁的后裔。在面外国人的时候，我能深刻感受到这一点，因为他们语言、思想、体征都属于一个不同的类型。但是事实是否是这样，归根结底没有什么现实意义。我是英国人，即便我的祖先是法国人，这一事实也不会变。但是我是英国人不是法国人这一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人类以什么样的方式，有什么样的族群划分，取决于观察者的视角。人类学家根据某些体征的不同来进行种族划分。举例来说，布卢门巴赫^[6]依据肤色，雷齐乌斯^[7]依据头骨的形状，近来一些人类学家依据毛发特征。人种学家在语言的基础上，发现了新的差别，这些差别是人类学家所不知道的。人种学家谈起印度日耳曼语系、闪米特语系，而人类学家却反对，称自己并不知道有这种差别，对他来说，印度日耳曼语族和闪米特语族同属一个族群。而从政治科学来看，又有不同的族群划分，语言、体征在这里并不能决定什么。我们和诺曼底人^[8]语种不同，但是政治族群划分相同，我们同英裔美国人语种相同，但是属于不同的政治族群，因为在政治科学里，是根据“国家”划分的。

p.16 对人类进行“国家”划分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一划分有其普遍性；其次，因为它有其强度和重大影响。当说起“国家”划分的普遍性时，在相当程度上我是以“国家”一词的一般概念来展开的。以希腊、罗马或者欧洲来说，“国家”一直以来毫无疑问具有普遍性；相反，以整个人类来看，

是故当知国之为义，与所居地土之义大有悬殊。吾国之人，所以于政治之学，国家之义，自西人观之，皆若不甚分晓者，止缘大一统之故。吾所居者，只有天下，并无国家。而所谓天下者，十八省至正大中，虽有旁国，皆在要荒诸服之列，以其无由立别，故无国家可言。如今云“爱国”二字，今义与古义绝殊。即言国家思想，亦非箇中人，真不知为何等思想矣。今假吾对众言曰：吾是中国人。诸公试察吾作此言时，意主何义？将谓吾所言者，意主所生长之种族乎？非也。顾此语虽不得以为全是，要为近之。何以云其近耶？盖不佞与四百兆人，粗而云之，固同是炎黄贵种，当其太始，同出一源。设此语宣于伦敦巴黎之间，其意尤为显著。吾与彼人，语言不通，形貌有异，宗教不一，所谓黄、白二种之分是也。所不得以为全是者，盖种族与国，绝然两事。世尽有种族虽同，不必同国。如今日之台湾人，南洋各岛之洋籍，甚至日本、法、美之中，常有与吾同种族，而不可以为同国者。又有同国矣，而不同种族，则如往者之朝鲜、琉球，今日之满、蒙人，皆与之异种，而又为一国之民者也。

夫人类之为分，众矣。治民种

⁶ 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 (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 1752 年 5 月 11 日—1840 年 2 月 22 日)，德国医学家、生理学家、人类学家。

⁷ 古斯塔夫·雷齐乌斯 (Gustaf Retzius, 1842 年—1919 年)。

⁸ Channel Islands 海峡群岛 (法语: Îles de la Manche, 英语: Channel Islands) 又称盎格鲁诺曼底群岛 (法语: Îles Anglo-Normandes) 是位于英吉利海峡中的群岛，群岛距离法国北部诺曼第只有大约 10 海里。Channel Islanders 这里翻译成“诺曼底人”。

这种普遍性并不存在。但是我们需要一个词来对一个大的组织进行界定，这个组织通常比家庭大但与家庭相连，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国家”是唯一可以适用的词汇。个别情况下，以“部落”或“宗族”、“教派”或“宗教”来界定会更合适。但是不论如何界定，这种组织现象都是普遍存在的。几乎每个地方的人都认为自己属于某个大的组织。他们认为自己的这种归属感是永远的；必要的时候，这个组织可以向他们无条件的索取；被呼召的时候，自己有义务为它献出生命。

p.17 因此，大多数引人关注、值得纪念的事例都源于这类大的组织的存在。起初，是这些组织自身的成长、发展，它们的呈现形式、经历各个阶段；其次是这些组织之间的交互，它们发动的战争、缔结的合约，各种征战、联盟；再次，是归属于这样一个组织对个人产生的无尽的影响，我们对这些无尽的影响进行归纳，并用“文明”一词来表述。这里，你看，就是一个可以无限思考的领域，因为它几乎包括人类历史上所有值得记载的事件，并且直接源于各处的人民都有国家归属这样一个事实。

这一特殊的人类现象（即“国家”此处为“国家”最广为接受的词义），区别于家庭但仍与家庭相连，区别于民族但有时与民族有大致的一致性，就是政治科学的课题。鉴于“国家”独有的特征，不管在哪个区域，它总是利用“政府”这一形式或者外饰出现，我们可以说政治科学研究的是政府，正如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财富，生物学研究的是生命，代数学研究的是数字，几何学研究的是空间和尺度一样。

p.18 这就是科学的课题。这门科学呈现的题目有两个层面的清晰划分。第一个层面是国家自身的内部结构和发展，国家政府的构成形式，政府运行的机制；接下来一个层面是国家之间的交互，或者说国家的外部活动。

那么现在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方法来研究这些题目呢？你们清楚科学调查取决于方法。你们也尤其清楚在调查人类现象时会面临怎样的特殊难题。因为，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几乎无法抵制的倾向——混淆事实与看似事实。因为我们知道正确的政治活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会认为政治科学如果有任何意义的话，应当要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在这个牢固的先入观念下，我们极易仅从对与错的范畴来展开调查

之学者，其分法本之外形为多。如卜鲁门拔(Blumenbach)以色，烈支孺斯(Retzius)以颅，而今有人，又分之以发，如云将西人之发横断，其剖面为椭圆。黑色人之发，其剖面如腰子小豆。中国人之发，其剖面成正圆形是已。而最靠得住者，莫如言语。彼谓印度与欧人，所以同为伊兰种人者，以其言语，推至古音，大概相合。如“耕田”，如“磨麦”诸语，如“父母”、“君民”、“上帝”等称，其原皆出自梵语，所以知之。

顾不佞之意，则不甚谓然。盖若必用言语，则支那之语，求诸古音，其与西语同者，正复不少。如西云 mola, mill, 吾则云磨。西云 ear, arare, 吾则云犁。西云 father, mother, pama, 吾云父、母、爸、妈。西云 Khan, King, 吾云君。西云 Zeus, Dieu, 吾云帝。西云 terre, 吾云地。甚至西云 judge, jus, 吾云则，云准。西云 rex, ricas, 吾云理，云律。诸如此类，触处而遇。果使语言可凭，安见东黄西白不出同源？且其分也，在教化甚高之会乎？虽然，种族之异，非邦国之分。邦国之分，别有关系，不在语言、形色。故美、英不为同国，而海峡中诸岛之民，其上语往往为英人所不省者，可以证之。

何以言邦国之分，于人民有最大关系耶？一因其事为人类所同有之区分；二缘自有此分，而生出无穷之效果。吾谓人类所同有者，亦以大经言之，盖社会必入军国程度，

研究。如果我们这样展开的话，我们的目标会变成寻找完美的或者理想的国家。我们的第一步会是考察国家存在的目的，在找到了我们满意的目的之后，下一步就是寻找怎样的机制、法律和实践最适合这一目的的实现。这是政治科学的传统展开方式，也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用的方法。

p.19 我们可以采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把国家看作是跟植物和动物一样的自然生长物。我们可以跳出与它的个人联系，客观、如实地记载我们的观察。自然主义者不会以上一段描述的方法展开研究。他在研究植物的时候，不会首先考虑一个植物存在的目的，也不会进一步归纳一个完美的植物应当具有怎样的特征。他根本不会称自己认为植物存在目的，更不会说他认为一个植物比另一个更好。他不会涉及对与错的范畴，只是尽力：（1）对自己观察到的植物进行分类；（2）分析植物的结构，区别不同器官的功能；（3）追溯它的成长过程，推断可能出现的病变；（4）思考不同物种的源起，以及植物整体的一般性。

现在我想你们可以立刻看到以同样方式来考察国家的可行性。同样，我们可以对各个国家进行归类，对一个国家不同的机体及其特征进行描述、记录；对国家自身的发展阶段和病变条件进行观察；进而用进化论对国家现象进行思考。

p.20 你可能会认为这样的展开非常奇怪、反常。毕竟，一个国家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生长物，而是人类意志、发明、独创的产物。归根结底，国家都要进入对与错、好与坏的区分；一个制度、一些法律是好的，其他一些则是不好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面对政治学，所经历的困难，饱含的热情，便没有了意义；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对与错的区分，以及与之相对的所有分类和分析就没有了重要性和意义。

确实，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是主观创造的产物，换言之，是机器。但是他们又不仅仅是机器。国家不是创造物而是生长物，这一点已经成为政治的轴心。国家的根源是人类本性中潜意识的、本能的部分，这也是为什么，虽然我们不能把国家单单看作是自然产物，但是应该要看作是类似自然产物。

此外，经验告诉我们，在每一个思想领域，面对亟需解决的问题的时候，都存在过于轻率、过于直接、过于迫切的

而后乃真有此分。其始只分种族、峒社、宗教，但随地之民，皆觉此身于一家而外，另有一团体，甄录治保其身。此种团体，程度高下迥殊，是为邦国，或称国家，西文所谓 state 是已。

邦国之为团体也，吾人一属其中，终身不二，生死靡他，乃至紧要时会，此种团体其责求于我者，可以无穷，身命且为所有，何况财产。但其责求既已隆重如此，故必有至精至严至善之法制行乎其中，此则讲治理者之所有事也。欲识此等团体为何物，必察其物之所由生，与其团体之逐层进步。进步之际，形式不同，变象不一，此其自内因而言之者。至于外缘，则二团体相遇，其对待相加之形势，不相得而为战，为剋灭；相得为联合，为交通。此皆有绝大果效者也。内因外缘而外，尚当察其中分子为何如。盖人以所居邦国之异，其形体精神，理想行谊，皆从以悬殊，凡此之谓教化。是故充而论之，人类万殊，由于所居团体之各异，而此团体，即政治家所指之国家。

双称“国家”，单举曰“国”。国之为言，与土地殊，与种族殊，又与国民国群等名，皆不可混。诸公应知科学入手，第一层工夫便是正名。凡此等处，皆当谨别牢记，方有进境可图，并非烦赘。所恨中国文字，经词章家遣用败坏，多含混闪烁之词，此乃学问发达之大阻力。诸公久后将自知之。今者不佞与诸公谈说科学，而用本国文言，

风险。因此，第一批药理学者才会希望找到一个万能药方，第一批化学家才会希望将任何物质提炼成金。回顾政治科学第一批近现代著作，我们可以看到原始契约理论，父权理论等与上述例子相似的、惊人的错误论断。无论如何，我已经充分论述了我的论点即以植物和动物研究相同的研究方式来对待国家。

p.21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如果采用这种方式，政治科学应当包括哪些方面。通过归纳性考察，可以发现政治科学寓于史实之中，并随之变化。首先要尽可能地收集史实，对其进行严谨地考证，因为经得起科学考证的史实极易与谣言、传说或者组织宣传相混淆。其次，要避免用固有理论验证的史实作为支撑；应当把所有理论放到一边，在对史实的考证过程中看哪些理论会应运而生。为了实现这一点，应当首先对这些史实进行分类、重组，举例来说，国家内在成长过程中的史实应当归为一组，而国家对外活动或者国家之间的互动相关的史实应当归为另外一组。鉴于这一课题的复杂性，如果分类过程跟其他科学，特别植物学和动物学一样棘手、繁重，就不太好了。

p.22 但是进一步来讲，我们知道归纳性科学从两个方面来获得例证，有时候是通过实验，即研究者人为构造他想要研究的实例；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基于例证本身的特殊性质，无法进行实验。举例来讲，化学实验是可行的，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两个物质之间的联系，就把它们放在一起、观察结果。天文学实验是不可行的，太阳和月亮都不是我们触手可及的，我们需要等待现象的发生而不是相反。那么对于后一类来说，科学观察作为唯一渠道，需要竭尽全力、严肃谨慎地进行。这里所说的一切都基于大量——怎么说呢？我本来要说“历史的”——严谨观察、切实记载的事实。

既然已经确立政治科学是归纳性科学，接下来我们就来探讨是通过实验还是通过观察来展开研究。很明显，在这个方面，与化学相比，政治科学与天文学有更多的相似性。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想要验证突然引入民主机制对一个国家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不能选择一个目标国家，通过必要的改革法案，然后坐观实施结果。我们能做的是以当下的国家或者以历史上有记录的国家为研究对象。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对科学研究至关重要的事实。政治科学，跟天文学一样，

正似制钟表人，而用中国旧之刀锯锤凿，制者之苦，惟个中人方能了然。然只能对付用之，一面修整改良，一面敬谨使用，无他术也。诸公务察此意。

政治问题曰国家。凡是国家，必有治权。而治权以政府为之器，故天下无无政府之国家。政治之论治权、政府，犹计学之言财富，名学之谈思理，代数之言数，形学之言线、面、方、圆。而其论国家也，分内因外缘为二大干。内因言其内成之形质、结构、演进、变化及一切政府所以用事之机关；外缘言其外交，与所受外交之影响。

学有问题，乃其正鹄目的。但达此目的，得此正鹄，又将由何种之涂术而后能？诸公知学问之事，往往因所由涂术不同，其得果因而大异。此于讲求群学之事，所系尤深，盖其关于人事最为密切矣。而其物为人人口头共有之谈，因其习惯，自诡已明，而其实不尔。若谓他物，吾或不知，至于国家政府，吾何不知之与有？吾今所欲闻者，政治以何术为最善，政府以何形式为最高耳。以此之故，其入手之始，往往不求知物，不问此系何物，而先问物宜如何。其言政也，则先欲知何者应利，何者应害。其言政府也，则先叩何式为合，何式为离。夫假以是为术，则所求之第一事，将在何者为最文明之国家，最为利益生人之治制。此吾国言治之书，自古迄今，莫不如此。且不独吾国然，欧洲十九世纪以前言治之书，

需要大量切实可靠的观察记录。

p.23 但是国家是一个道德实体，不像太阳或者月亮，是物质实体。国家不是肉眼或者借由望远镜可见的。所有的举措都只是推定性的，确切来讲，是某些个体而非国家整体采取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举措都是暗中进行的，有时候会有意把假象呈现给公众。因此，相比其他科学，政治科学面临的事实验证要复杂的多。尤其是，我们现有的大量观察材料，都是由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观察记载的，并不是完全切实可靠；有时，因为观察者并不是科学领域的，或者带有偏见，或者观察的出发点是娱乐消遣、没有严肃的目标，或者他们生活的时期，并不熟知或者很少使用记载技巧。我们不能对这些观察材料置之不理，不能像其他科学一样，不加验证直接使用，如何验证应当酌情而定。

p.24 你会发现我所说的大量的观察记载与我们所谓的历史是等量的。如果我们把历史看作是由并不十分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的观察者收录的大量事实，基于这些事实，来建立归纳性科学，那么困扰着历史学家的课题本身的复杂性，阻碍他们建立政治科学的科学方法的混乱性，都会消失。

我说这些观察者并不十分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而非完全不清楚。如果查看历史本身和历史记载，通过记载的和省略的历史，你会发现观察者本能地意识到历史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我前面提到，那些曾经有记载的多个领域的事实在被故意删减。也有一些事实，虽没有被故意删减，但是潜意识地被省略或者一笔带过。这些事实有的时候是很重要的。詹姆士一世的撰史者极少提到莎士比亚的戏剧；他记录了很多罗伯特·卡尔⁹的仕途起落；威廉三世的撰史者极少记载牛顿的发现，却详细记载了约翰·芬尼克¹⁰密谋叛变。莎士比亚和罗伯特·卡尔，牛顿和芬迪克，哪个更重要一些呢？卡尔的影响力和芬迪克的密谋都影响到了国家，而莎士比亚和牛顿的影响则是在另外的领域。撰史者本能意识到后者不属于他们的领域。他们略过这类现象，或者把它们放在补充

亦莫不尔。柏拉图《民主客论》，其职志也。

是故取古人谈治之书，以科学正法眼藏观之，大抵可称为术，不足称学。诸公应知学术二者之异。学者，即物而穷理，即前所谓知物者也。术者，设事而知方，即前所谓问宜如何也。然不知术之不良，皆由学之不明之故；而学之既明之后，将术之良者自呈。此一切科学所以大裨人事也，今吾所讲者，乃政治之学，非为政之术，故其涂径，与古人言治不可混同。吾将视各种国家，凡古今所发现者，如动植物学家之视虫鱼草木。然彼之于所学也，初不设成心于其间，但实事求是，考其变相因果相生而谨记之。初不问何等草木为良草木，何等虫鱼为良虫鱼。无所谓利害，无所谓功过，而所求明者，止于四事：（一）所察日多，视其不同，区以别之，为之分类，一也；（二）一物之中，析其官体之繁，而各知其功用，二也；（三）观其演进之阶级，而察其反常，知疾痛病败之情状，三也；（四）见其后果之不同，察其会通，而抽为生理之大例，四也。

故吾党之治此学，乃用西学最新最善之涂术。何则？其涂术乃天演之涂术也。吾将取古今历史所有之邦国，为之类别而区分；吾将察

⁹ Robert Carr, 1st Earl of Somerset, (c. 1587 – 17 July 1645), was a politician, and favourite of King James VI and I. 罗伯特·卡尔，第一代萨默塞特伯爵，政客，詹姆士六世和一世（詹姆斯一世是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君主，他的苏格兰君主称号是詹姆斯六世。）的宠臣。

¹⁰ John Fenwick, who began to plot against the new King William, for which he underwent a short imprisonment in 1689. 约翰·芬尼克，密谋叛变威廉国王，后于 1689 年短暂入狱。

章节，尽管有时候他们并不十分了解这种精确的本能，甚至会为那些只能称赞君主的伟绩、贬斥野心的勇士的罪行，忽略真正的伟大、更耀眼的成就，而感到惋惜。其实，并没有什么可惋惜的。因为问题的关键不是荣耀或者伟大，而是准确地知道“国家”这个机体的运行规律。政府和立法，战争和联盟，都与国家相关，而科学发现或艺术成就则不然。

p.25 二十年前，当巴克爾先生成功更新了英国人对历史科学的理解时，^[1]他提出了革新历史撰写的挑战。自此，关于政府、议会、战争的记载相对减少，历史开始讨论人类的物理环境——气候、地理、食物等。我的观点与之不同，也没有很大的革新性。我不否认这些物理研究的重要性，历史学家也应当利用这些研究的结果。但是，在我看来，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是与之不同的。他不是人类学家或者人种学家，请允许我这里引入一个新词，他是政治科学家。政治群体或者机体——国家——是他的研究对象。从这一原则来说，历史学家一直以来大体上是对而非错的。他们关于立法和体制发展的研究为政治科学的第一部分即国家划分和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关于战争、征战、联盟、联邦的考察，为政治科学的第二部分即国家之间的互动，奠定了基础。

p.26 他们所要做的应该以更清晰的目标，继续他们开创的道路。他们总体上是正确的，但是因为迟疑不定，所以断断续续。一直以来，他们被禁锢在一个观念里即自己有义务记载给定国家内发生的所有重要事件；简言之，他们把国家实际当作是自己的课题，而事实上他们的课题应当是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他们把自己看作是文人，不是科学人，认为自己的职责与诗人类似——记述英雄事迹，影响读者情感。以宏伟的叙述形式记载伟大事迹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如果认为这与国家研究者的职责密不可分，认为文献管理者、证据裁定者、政治现象专家、历史因果关系辨别者自身也应当兼有富有表现力的叙事能力，像史诗诗人或者民谣散文作家一样，那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就忘了我们生活的时代不是希罗多德、修西得底斯或者李维的时代，而是专门研究的时代。古代历史学家既有通俗文人又有科学人的身份；而这两个身份目前已被分离、区分。我们现在有富有表现力的叙事者，有时甚至可

其政府之机关，而各著其功用；吾将观其演进之阶级，而考其治乱盛衰之所由；最后，吾乃观其会通，而籀为政治之公例。诸公视此，吾党岂有丝毫之成心，惟祛其成心，故国家之真理可以见。

诸公将曰：异哉所闻！夫动植之学，所可用若前之涂术者，以其物天之所成，而非人之所设也。国家政府之为物不然，故其治之也，必问其良否，必分其功过。但如草木，区以别之，未见其术之有当也。则不知邦国政府虽属人功，而自其大分言之，实游于天演之中而不觉。大抵五洲民人所共有者，其事皆根于天性。天性，天之所设，非人之所为也。故近世最大政治家有言法人萨维宜：“国家非制造物，乃生成滋长之物”。夫既属生成滋长之物，则天演涂术不能外矣。

更有进者，夫世之勤勤于一学，孰不有意于人事之改良乎？顾求至美之物，而卒至于无所得，或所得者妄，而生心害政者，其故无他，坐用心躁耳。故言天学，而沦于星命，言化学而迷于黄白，言政治而乃主民约，皆此类也。

苟必始于知物，则所由内籀之术明矣。内籀必先考求事实，考求事实则一切如《群学肄言》之所戒，皆必除之而后。此虽繁难，不可以已也。且政治之考求事实，有较他科不同者。他科可用试验，如治化学，欲知轻养之合而为水，取而

¹¹ 巴克爾，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1，历史学家。

与史诗诗人齐名，比如著有《法国大革命》的托马斯·卡莱尔。我们也有历史学家，但是很少有人兼具文人和科学人的名分。这里的历史学家是“国家”的研究者，并以归纳性的方式即借由历史，来进行研究。

p.27 这是我努力的方向，也是我想教导你们的。如果想要成功，就必须两个步骤同时进行。我们必须思考、判断、总结、界定、区分；同时也必须收集、考证、探究事实。如果我们忽略了第一步，我们就成了没有目标地累积事实，因为我们没有可以区分事实重要性的检验过程；如果我们忽略了第二步，我们的判断便没有了基础，我们不能仅仅编织知识网络。

p.28 在这一期的讲座当中，我将向大家介绍第一个步骤。我所说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并不是特指。我想现在你们应该了解为什么我认为，作为历史学教授，我有责任这么做。

【下文是 1891 年第一期讲座的结论，这里恰好引用、作为本次讲座的附言。】

在这之前的多次讲授中，我向我的学生介绍了历史学的这一概论。有时，我自己会质疑，把历史作为归纳性材料，在这基础上构建政治科学，这一点如果真的可行的话，是不是早就应该有成果了，毕竟政治构想家 18 世纪有孟德斯鸠，17 世纪有洛克和霍布斯。当其他科学都已稳步建立，为什么政治科学这么重要的学科，却停在原点？我后来找到了答案。答案就是：缺少归纳的基础。孟德斯鸠或者洛克自身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世界的历史。这里“不知道”是字面意义上的“不了解”。一百年或者一百五十年前，人们对历史事实几乎没有全面的了解。这部分是因为我上面提到过的文人偶尔的历史描述，这些历史描述通常没有价值，却清晰地揭示了历史批判的萌芽，历史描述处理官方事件的不确定性，历史整个学科的新颖和不成熟。事实上，我们现在所谓的历史的几乎都是从那时开始发展起来的。

p.29 如果是这样，如果历史本身都还是近代的长成物，那基于历史进行阐释的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有待未来发展这一点就没有那么令人惊讶了。18 世纪中期所谓的历史还未发展成熟，不能作为任何学科的生成基础。这一点在现在有了改

试之足矣。乃至动植，亦有可试者。顾国家者，天地之大物也。而祸福所及者重以众，故试验不行，而惟资于观察。且观察矣，又不若天象、地文之事也。盖国家有性情之物也。其行事发现，虽关团体，而常假手于一二人；又常出以秘密，而故为混淆以贸视听者有之；又以纪载者之不能无成心，而或出于轻忽。此史事所以如时下报章，最为难信。欲为考辑，必待能者，而能者则今日所称之良史也。

古之史家，其亦略知吾说者耶？人或笑左氏为相斫之书，或谓中国之史，不过数帝王之家谱，此其说似矣。然使知历史专为政治之学而有作，将见前人之所详略，故〔固〕为适宜。且中国既为专制矣，则一家之所为，自系一民之休戚，古人之所为，殊未可以轻訾也。英国有拔可尔者，尝著《文明史》一书，一时风行，几谓旧史所载，皆无关宏旨之文，而所重者，专在天时、地利、水土、寒热之间。不知此固重要，而史家专业，在纪人事，而于一切有关政治者，尤所重焉。夫天地之实纪者，自有专家。且十常侍之乱汉，与郑康成之诂经，二者于社会所关皆巨，而史家终略于此而详于彼者，何则？以彼之关于政治尤深切而著明耳。

此后吾党之言政治，大抵不出内籀之术。而同时所为，有二种功夫，一是区别定名之事，一是考订沙汰之事。盖不为其前，将虽有事实，而无纲纪；不为其后，将所据

观。现代的学者拥有大批确实可靠的历史知识，并且可以用来用作科学研究。

已误，而立例自非。今吾八会所为，重在会通提挈，而考订沙汰之事，又不得不藉手于他人所前为者。吾闻西师有言：一二百年以前，欧洲几无信史可用。史之可信，大概不过百年。是故当时政治大家，如郝伯思、如洛克、如孟德斯鸠等，皆以盖世哲家，所成就不过如彼。而此学演进，全俟后人。夫后人之所以为，非果胜于前人也。穆王得八骏，有王良、造父为之先后，而后日行千里。近世走卒病夫，安坐三等汽车，其所行倍之，亦其所权借优耳，后人非能果胜前人也。

在《政治讲义》第一讲中，原著者主要论述了，1，政治学和历史学的关系；2，历史记录与政治学的成立，后者何以被视作一门科学；3，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及主要内容是什么？4，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如何？而严复在讲演和最后成文时更加强强调了：

- 一、什么是“学”，什么是“术”？
- 二、术语及其定义对于科学的重要性；
- 三、政治学和群学之关系；
- 四、政治学的基本方法：归纳法及验证的重要性；

下面我们按照西莱论述的思路分别进行讨论。

（一）**历史学与政治学** 原作者西莱在说明了将要采用的授课方式后，用了较大的篇幅解释为何一个历史学教授要讲授政治学。西莱的结论是 *History without political science has no fruit; Political science without history has no root.*（离开政治科学的历史学是无果之树；而离开历史学的政治科学是无根之树）。西莱就是要在一系列讲座中证明讲授政治科学就是在讲授历史学这一貌似悖论的命题。

讲演稿全文刊登时，严复在文章前面加了一个“自叙”，“自叙”所署日期为“乙巳十二月二十六日”，即1906年1月20日。自叙中严复首先介绍了西方天文学在中国明代以后取得了巨大进步：“尽破地静天动旧说”，而且“日亦非常静不徙者”。严复用了一句19世纪传教士在科普文章中常常用来形容天体运动的话：“一出入息间，不知其几千万里也”。严复“喟然叹曰：伟哉科学！”这里的“科学”无疑是指天文学等形下之学。严复指出“五洲政治之变”都“基于此”。天文学的新发现加速了封建的、宗教的旧秩序的崩溃，“三百数十年之间，欧之事变，平等自由之说，所以

日张而不可遏者，溯其发端，作由此乎？”^[12]而 19 世纪以来天演之学又“大盛”，平等自由的理念更加深入、普及。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岂非学术也哉！”这里的“学术”与前文的“科学”同义。

在第 1 讲开头，严复先讲缘起：“谓国家近日将有立宪盛举，而海上少年，人怀国家思想，于西国政治，所与中国不同者，甚欲闻其真际。”但有人会说“查政治一学，最为吾国士大夫所习闻。”“何必舍其家鸡，而更求野鹜乎！”严复指出“盖政治一宗，在西国已成科学，科学之事，欲求高远，必自卑迹。”所谓“欲求高远，必自卑迹”即《天演论》中的“道每下而愈况”，是培根所主张的观察自然，探索自然，驾驭自然的思想。“已成科学”即关于政治现象的思索在西方由于采纳了形而下学的基本原则，已经从“政术”升华为“政治学”。^[13]严复要讲的不是中国的旧学，而是作为科学的政治学。要讲解科学则需要，一“名义了晰”，二“思理层折”。即定义严谨的术语和科学的思维习惯。尤其是前者乃科学论述的基础，不然“有时语意已极明白，而犹以为深远难明；或自谓已悟，而去实甚远。”严复在这里所表达的观点是他特意为中国听众加译的，并且始终贯穿整个讲座。接着严复转入正题说“今夕所论，未及政治本题，乃先言政治与历史相关之理。”并准确地译出了西莱的箴言“西人言读史不归政治，是谓无果；言治不求之历史，是谓无根。”

（二）历史载籍与政治学的成立，后者何以被视作一门科学？在这一设问下，西莱写道：我们大量的知识是归纳性的或是建立在对事实的观察之上的。如果，我们把历史看作是对已发生事件的记录，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的知识来源是历史。历史记载事件是为了找寻规律、引导人类生活。这样的观察记载催生了自然科学史上的许多重大发现，是自然科学最初被称为“自然史”（nature history）的原因。这种记载同时也填补了早期历史学的大量空白。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很多现象、事件，我们不再把它们当作历史来讲述，而是作为科学来对待。比如，现在我们并不能从历史学家那里获得关于生理学和病理学事例的信息，不管这些病例多么重要，除非一种传染病大规模流行，并且对社会和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样，原本归属于历史学的内容，一个又一个地被划入“科学”之后，历史学便成了“剩下的部分”（*residuum*）。就像现在几乎不再提及自然史一样，隶属历史学家研究领域的事例是否也会在不远的将来被其他科学领域占据？历史学被科学所吞没，历史学家将成为多余的那一天会到来吗？西莱给出的回答是：“剩下的部分”不会渐渐减少或者被其他科学瓜分，而是会成为一门单独的科学。什么科学呢？政治科学。西莱说这就是自己为何强调讲授政治科学就是在讲授历史学的原因。

西莱指出：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有一门科学（a science）是随着历史学缓慢发展的。每一个人都能看到它和历史学有某种联系，并从历史学中获取了大量材料，这就是政治科学。而历史学也只有与政治学紧密相连才能成为一门科学。

¹² 参见沈国威著《严复与科学》，私家版，2015年第1、2章。在接下来的讲座中，严复反复论述了科学的进步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

¹³ 参见沈国威著《严复与科学》，第1章。

对西莱的这段原文，严复先说 18 世纪以前，已经有人主张“言治不由历史”，“本历史言治”始于孟德斯鸠（此处与西莱原文不符，似为严复笔误。详后）。严复说“我们中国论史，多尚文章故实，”所以有人说“以历史为科学材料者，文章之美，必不及前，而纪述无文，即难行远”。严复批评这完全是片面的看法，“不知史之可贵，在以前事为后事之师。”^[14]接着严复以苏轼为例，教导年轻听众如何读史书后，开始介绍归纳法。西莱指出人类的知识都是归纳的结果，严复在此例举了中国听众所熟悉的例子进行说明。最后严复提及了历史学逐渐成为“剩余物”的议论：

科学日出，史之所载日减于古矣。而减之又减，终有其不可减者存，则凡治乱兴衰之由，而为道国者所取鉴者。是故所谓国史，亦终成一专门科学之历史。是专门科学何？即政治之学也。

我们不得不承认西莱的原义并没有明白易懂地译出来。^[15]严复说中国古已有政治一科，如老子、如司马迁。《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是代表性的著述。但是中国把道德和政治混杂在一起，不加区分。

（三）政治学的研究课题 在这一部分，西莱集中地论述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西莱说：虽然我们要研究的并不单单是人类的社会性（sociability），而是与人类的社会性相关的一个特别的现象。人类社会除了家庭（family）之外，还有另外一层联结，另外一个更高的组织形式，这就是国家（state）。接着，西莱发问“什么是国家？”血缘、人种、语言、宗教、民族都不是认定国家的决定因素。西莱指出国家是人类特殊的现象，区别于家庭，但仍与家庭相连，区别于民族（nation），但有时与民族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这就是政治科学的课题。同时，鉴于“国家”不管在世界哪个区域，总是以“政府”这一形式，或者外饰出现，西莱指出可以说政治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政府。

关于这一部分的译介，严复显然受到了当时听众的“常识”和来自汉语本身的限制。在常识方面，西莱使用 sociability 指出了人类的特点，society 对于他的学生来说是基本常识。但是严复面临的则是不同的情况。1904 年严复翻译出版了《社会通论》，1903 年出版的《群学肄言》中也有很多介绍西方社会学的内容，关于“社会”的相关知识逐渐为中国的读者、听众所知晓。尽管如此，严复还是选择从“群”开始讲起，加入了大段的社会进化的内容（惟关于语言学的论述以今天的观点来看是不正确的）。而更令严复棘手的是汉语本身的问题。原文的 state, nation, organization,

¹⁴ 严复早在翻译《原富》时期，就与吴汝纶讨论了历史叙事与文章的关系。吴汝纶一方面认为：“若名之为文，而俚俗鄙浅，荐绅所不道，此则昔之知言者无不悬为戒律”。但同时又说：“如今时鸦片馆等，此自难入文，削之似不为过。倘令为林文忠作传，则烧鸦片一事固当大书特书，但必叙明原委”。《严复集》五，第 1564~1565 页。本函时间为 1899 年 4 月 3 日。参见沈国威“19—20 世纪之交的翻译与汉语：以严复为说”，李雪涛编《合璧西中》，北京：外研社，2016 年 638~655 页。

¹⁵ 《严复集》五，1244 页。接着译道“有科学即有历史，亦有历史即有科学，此西国政治所以成专科。”这句话应作如下理解：自从有了对自然界的观察记载就有了历史，在对历史记载的归纳和整理的过程中获得了“公理大法”，这种追求反过来又促进了科学的进步，这也是西方政治学成为一科之学的原因。

甚至连 family 在当时的汉语里都没有固定的双音节译词。以 state 为例, 严复先从概念上说中国“只有天下, 并无国家。而所谓天下者, 十八省至正大中, 虽有旁国, 皆在要荒诸服之列, 以其无由立别, 故无国家可言。”在这里严复是用“国家”译 state 的。但原文 family 和 state 对举, 如西莱所说是既互相区别又互相关联的对峙概念。所以用“国家”译 state, 其中的“家”似乎令严复深觉不安。^[16]严复在紧接着的译文中试图改用“邦国”对译 state, 但显然“国家”是更一般的词语。因此, 严复不得不先交代: “双称‘国家’, 单举曰‘国’”, 然后再提醒听众“国之为言, 与土地殊, 与种族殊, 又与国民国群等名, 皆不可混。”严复说“诸公应知科学入手, 第一层工夫便是正名。”但当时汉语的情况显然无法让严复满意, 他借题发挥式了如下的一通感慨:

所恨中国文字, 经词章家遭用败坏, 多含混闪烁之词, 此乃学问发达之大阻力。诸公久后将自知之。今者不佞与诸公谈说科学, 而用本国文言, 正似制钟表人, 而用中国旧之刀锯锤凿, 制者之苦, 惟个中人方能了然。然只能对付用之, 一面修整改良, 一面敬谨使用, 无他术也。

关于科学的术语问题, 严复在后续讲座中多次提及, 在此不赘述, 留待次稿。尽管严复对当时的汉语极为不满, 但也“只能对付用之”。

接下来, 西莱讨论了应该采取怎样的方法来研究政治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方法是考察国家存在的目的, 在找到了令人满意的目的之后, 下一步就是寻找怎样的制度、法律, 进行何种实践才最适合这一目的的实现。对于古希腊以来的旧观点, 西莱提出了一个崭新方法, 即把国家看作是跟植物和动物一样的自然生长物, 客观、如实地记录观察的结果。为此西莱提出了 4 项方法, 并认为这样就可以以同样的方式, 客观地对各个国家进行归类; 对一个国家不同的机体及其特征进行描述、记录; 对国家自身的发展阶段和病变条件进行观察; 进而运用进化论的观点对国家现象进行思考。然后, 西莱对政治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作了整理: 首先尽可能地收集史料, 继之以严谨的、归纳性的考证。西莱指出了归纳性科学获得例证的两个不同方法: 直接试验和间接观察。西莱说, 化学实验是可行的, 而天文学实验是不可行的。在这一点上, 政治科学与天文学有更多的相似性。但是, 西莱也指出, 国家是个道德实体, 不像日月星球是物质实体。所以, 政治科学的事实例证要比其他科学复杂的多。西莱认为巨量的史料与历史具有相同的价值, 是建立历史学这一归纳性科学的基础。

西莱在第 1 讲末尾告诫学生: 必须思考、判断、总结、界定、区分; 同时也必须收集、考证、探究事实。这是两个互相依赖的重要步骤。

作为第 1 讲的结语, 西莱指出, 政治科学长期停滞不前, 是因为缺少进行归纳的史料上的基础, 18 世纪的孟德斯鸠或者洛克自身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世界的历史。然而这一切现在有了改观,

¹⁶ “国家”“妻子”这一类型的词, 词汇学上称之为“偏义复词”, 即由两个意义相反的成分构成, 其中后一个字并无实际意义。

今天的学者拥有大批确实可靠的历史知识，可以据此进行历史学的研究。

对原著这一部分，严复有加译、强调的内容，但总体上仍比较忠实原文。严复先说科学不仅要有目的，还要有为达此目的途径。以前谈论政治，“往往不求知物，不问此系何物，而先问物宜如何。”即不去认识自然，只想驾驭自然。^[17]不但中国如此，19世纪以前欧洲的政治学书籍也都是这样。严复指出：

取古人谈治之书，以科学正法眼藏观之，大抵可称为术，不足称学。（中略）学者，即物而穷理，即前所谓知物者也。术者，设事而知方，即前所谓问宜如何也。然不知术之不良，皆由学之不明之故；而学之既明之后，将术之良者自呈。此一切科学所以大裨人事也，今吾所讲者，乃政治之学，非为政之术，故其涂径，与古人言治不可混同。

在这里严复再一次阐发了如《穆勒名学》引论中提到的“学”与“术”的不同之处。严复比较准确地译出了西莱的4项方法。严复不但完全同意西莱的观点，还在其后的译文中通过加译多次予以强调：

- 故近世最大政治家有言法人萨维宜：“国家非造物，乃生成滋长之物”。夫既属生成滋长之物，则天演涂术不能外矣。（1249页，第一讲）
- 斯宾塞诸公，以国群为有生之大机体，生病老死，与一切之有机体平行，为之比较，至纤至悉，惜非此时所能详述。（1254页，第二讲）
- 故萨维宜谓国家乃生成滋长，而非制造之物。而斯宾塞亦云，人群者，有机之大物，有生老病死之可言，皆此义也。（1267页，第三讲）

将国家、社会、团体比作有机体是19世纪社会学的代表性的观点，孔德、斯宾塞都有大量的论述。

接着，严复开始说明治政治学的方法。治政治学“最新最善之涂术。何则？其涂术乃天演之涂术也。”收集史料，分门别类，考察政府的机关的作用，把握国家进化的事实，归纳出治乱盛衰的原因。然后对初步的结论进行验证，获得政治学的原理原则。严复指出这就是归纳的方法。归纳必先考察事实，考察时必须戒除如《群学肄言》所提到的各种偏见。同时，政治学上的考求事实，与其他学科有不同之处。其他学科，如化学、动物植物学可以试验，但是“国家者，天地之大物也。而祸福所及者重以众，故试验不行，而惟资于观察。且观察矣，又不若天象、地文之事也。盖国家有性情之物也。其行事发现，虽关团体，而常假手于一二人；又常出以秘密，而故为混淆以贺视听者有之；又以纪载者之不能无成心，而或出于轻忽。”这一段可以说是原著比较忠实

¹⁷ 宇田川榕庵等在谈到西方的植物学与东方的本草学的区别时也说：本草者，不过就名识物，详气味能毒。植学者，剖别花叶根核，辨别各器官能。而并不以实用为目的。参见沈国威《严复与科学》序章。

的翻译。^[18]

严复说“此后吾党之言政治，大抵不出内籀之术。而同时所为，有二种功夫，一是区别定名之事，一是考订沙汰之事。盖不为其前，将虽有事实，而无纲纪；不为其后，将所据已误，而立例自非。”但是如果这些法则不经过验证，往往无法保证其正确性；而且“德行”（即伦理学，笔者）和政治混杂不分，远没有达到科学的境界。^[19]严复说我们不能像古人那样（非若前人所为）“但举最上法式而言，而置每下愈况者于不顾也。是如动植学家，凡是草木飞走，皆当征验。”（1251 页，第 2 讲）所谓“每下愈况者”首见于《天演论》，即我们身边的各种自然现象。严复指出：政治学不是为政之术，同其他科学一样，政治学只需实事求是，找出社会变化的自然法则来。同时还必须对这些法则进行检验、印证。“此是格物穷理实事求是之学，固无虑意见之偏，宗旨之谬也。”严复在归纳法中更加强调了“征验”，即检验、印证，这是需要我们加以注意的。

在第 1 讲结尾，严复说：“吾闻西师有言：一二百年以前，欧洲几无信史可用。史之可信，大概不过百年。是故当时政治大家，如郝伯思、如洛克、如孟德斯鸠等，皆以盖世哲家，所成就不过如彼。”“西师”应该指“西莱”，严复完全赞同西莱所言：史料的获得以及对此加以归纳性的整理是历史学，乃至政治学赖以成立的基础，而 18 世纪的郝伯思、洛克、孟德斯鸠等由于时代的限制，都没有做到这一点。政治学作为一科之学的建立也晚至 19 世纪后半叶。

¹⁸ 写于 1898 年 10 月的《西学门径功用》（《严复集》一，93 页）中已经将归纳法的第一步“考订”分为二类：“观察演验，二者皆考订之事而异名者。盖即物穷理有非人力所能变换者，如日星之行，风俗代变之类；有可以人力驾御移易者如炉火树畜之类是也。”戚学民认为严复读西莱的原著在 1901 年之后（氏著《严复政治讲义研究》37 页），似有商榷余地。

¹⁹ 严复在《西学门径功用》中就指出过“会通之以求其所以然之理，于是大法公例生焉，此大《易》所谓圣人以有见天下之会通以行其典礼，此之典礼，即西人之大法公例也。中西古学，其中穷理之家，其事或善或否，大致仅此两层。故所得之大法公例，往往多悞，于是近世格致家乃救之以第三层，谓之试验。”（《严复集》一，93 页）